



性別學與婦女研究

華人社會的探索

張妙清、葉漢明、郭佩蘭
合編

張妙清、葉漢明、郭佩蘭 合編

性別學與
華人社
研究
探索

性別學與婦女研究

—華人社會的探索

編 者：張妙清、葉漢明、郭佩蘭
發 行 人：彭永強

出 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37 號
電話：(02)2566844、2575076
傳真：(02)2564690
郵撥帳號：一二〇四〇四八~一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授 權：香港中文大學

印 刷：建誠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30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86 年 7 月
I S B N : 957-9628-14-9

破損本或缺頁本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香港中文大學 1995 年

本書原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全世界。

本書著作財產權屬「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本版屬臺灣版，限在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發售。

序 言

一九八五年是聯合國婦女十年的終結。在七五至八五年間，中國大陸、臺灣或香港的婦女界並未積極參與國際性的婦女會議，而政府也沒有主動訂定婦女政策，但這三個地區卻不約而同地在同一內成立了第一個婦女學術研究單位，即河南省未來研究會婦女學會、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研究中心性別研究計劃，以及國立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這些學術研究單位，不僅成為華人社會性別學與婦女研究的先驅，也為婦女研究奠定了思想和方法的基礎，並促進各學科對性別主題的關注。

自一九八五年至今的十年間，上述三個地區的研究單位積極推動當地的研究、資料搜集、出版，以及學術交流，但除了香港分別與海峽兩岸接觸外，三地之間未有正式的聯繫。直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香港中文大學召開了「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研討會」，三地的婦女研究學者才首次共聚一堂，交流經驗，並對研究的方向作出回顧與前瞻。

本書所收錄的文章，除取材自該研討會其中兩節的論文外，更

另外邀請幾位作者撰稿，從歷史反思和理論層面探討婦女研究的一些基本課題，並從三個經濟政治體系不同的華人社會中的經驗，考慮在中國文化背景中研究婦女課題所面對的問題。

承蒙譚紳就女士以研究基金資助「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研討會」的經費，令會議得以舉行，而本書亦得以出版，在此謹致謝意。此外，各位撰文學者又充分合作，認真整理及修改文稿，使編輯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而尹寶珊女士提供各種支援服務，謹此一併致謝。

張妙清

一九九五年四月

導 言

•張妙清 郭佩蘭•

為什麼要開展婦女研究？

關於男女平等及女性權利等課題，西方人士早已有專書討論。一七九二年，英國的 Mary Wollstonecraft 發表 *A Vindication of Women's Rights*，轟動一時。同年，法國婦女亦著書指出婦女接受教育的機會漸增。一八四八年法國出版了第一本婦女雜誌 *La voix des femmes*；而英國的第一份婦女雜誌 *English Women's Journal* 亦相繼創刊。在美國方面，一八四八年在紐約 Seneca Falls 舉行的集會及發表的宣言，掀起了美國婦女運動的第一波。

西方婦女運動的興起及對婦女問題的關注，主要是由於工業革命後，社會發生了重大改變，男女的性別角色須作重新調整。另一方面，啟蒙時代的平等和人權之論，亦促使開明人士更加關心男女平等問題。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婦女投身於澎湃的革命運動中，其後，她們不甘心乖乖地走回廚房去。十九世紀時西方婦女接受教育漸趨普遍，女子大學的設立，更培養了一批關心婦女權益的知識

分子。此外，十九世紀重要的思想家如約翰·穆勒、恩格斯和佛洛伊德等，都有專文從不同的立場探討婦女問題。

在中國，婦女作為有意識的羣體，要到二十世紀初才出現，鼓吹男女平等的言論也隨之而興。在此之前，為婦女問題奔走呼籲的，主要還是男性。清代李汝珍撰的《鏡花緣》(1825)，諷刺女子纏足的惡習，可謂驚世駭俗之作。此外，俞正燮亦批評禁止婦女再婚、要求婦女守節的習俗。十九世紀提倡變法的鄭觀應及王韜，都分別發表關於改良婦女狀況的言論。戊戌政變時期，康有為及梁啟超力主廢纏足、興女學，雖為婦女請命，然其主旨卻是富國強種，多於男女平權的。

二十世紀初，留學日本的中國女學生受日本女權思潮影響，意識大大提高，她們希望將婦女運動介紹到中國。當時在上海，聚居了一羣受過教育和有進步意識的新女性，其中陳擷芬在一九〇二年創立了《女報》，一年後發展為《女學報》，其他的婦女報刊，如《女子世界》、《中國新女界》、《女界鐘》、《女界日報》、《北京女報》等，亦先後在上海、北京、日本等地面世，不斷鼓吹男女平權、婦女參政、女子受教育及就業的權利等。五四運動時期，女學生到街頭示威，高喊男女平等口號；向警予、丁玲、丁淑靜等撰文分析婦女現狀，呼籲改善婦女地位。五四運動的領導人如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均曾發表婦女解放的言論，抨擊封建傳統對女性的束縛。

六十年代，美國出現了第二波的婦女運動，婦女所爭取的是在憲法上的平等地位、在職業上的均等機會及在性方面的自由。此外，又力圖改善托兒服務、爭取墮胎權利，並關注黑人婦女所受的各種壓迫。另一方面，更逐漸深化婦女現況及有關問題的分析研究，使之發展成一嶄新學術領域。時至今天，美國許多大學均有婦女研究科目的開設，有些甚至有主修及副修課程，頒授婦女研究博

士學位。婦女研究嘗試從社會和文化層面了解婦女的處境、發掘婦女本身的經驗、探討改善婦女社會地位的方法及尋求達致兩性平等。歐美的婦女研究已經歷不同階段，由最初尋索在歷史上未受注意的女性的層面，逐漸走向兩性經驗、兩性關係研究的平衡發展期。

環觀世界，婦女研究在歐美有蓬勃的發展。在亞洲方面，日本於一九七九年成立「日本女性學會」，舉辦講座討論婦女課題，在大學開設婦女研究學科，並出版有關婦女的專書；在南韓，世界最大的女子大學——梨花大學設有婦女研究計劃，並有討論女性問題的專刊；菲律賓也不甘後人，除開設婦女研究科外，並陸續出版婦女研究叢書；至於幅員廣大的印度，亦成立了不少婦女研究中心，同時出版了很多有關印度婦女地位及角色問題的專書。

至於華人社會方面，婦女運動經常面對的疑問是：婦女問題和婦女運動是否西方文化的產品？亦有人抨擊婦女運動及其表達形式不符合中國文化；同樣，婦女研究亦遭受類似的質疑，被認為是近代西方社會科學輸入的翻版，脫離文化現實。

究竟華人社會的婦女學是由西方傳入的抑或是將西方思想和方法中國化後的成果？其在中國歷史中是否有深遠的歷史根源？本書多篇文章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婦女地位，並指出爭取男女地位平等的本土思想淵源，其中鮑家麟介紹俞正燮的男女平等思想、顧燕翎論述秋瑾為近代新女性的前鋒、潘毅指出五四運動時期的婦女解放的近代思想，在在反映了當時婦女所面對的社會不公平現象，雖然未能形成一股持續發展的社會力量，但也顯示婦女解放的要求並非僅是西方思想的近期移植。周顏玲的文章介紹傳統中國哲學如道家學說和《易經》所述的兩性特徵和相互關係，以及中國文學所反映的婦女地位，可見在任何文化傳統中，兩性的角色和關係，均是探討人類行為的一個重要環節。

在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中，男女平等的倡議也明顯受到西方思想的衝擊，例如五四運動及共產主義運動中男女平等的呼籲、婦女解放的要求、對封建制度的批判等，均受到當時西方國家及日本婦女運動或政治改革思想所影響，然而這些思想在中國如何演變及怎樣與傳統觀念產生衝突或整合等問題，實在值得進一步探討。

婦女研究是否適合在華人社會中發展？這問題反映了一般中國人對西方女性主義的定型偏見，認為婦女學過猶不及，鼓吹女性壓倒男性，提倡個人主義，破壞家庭的結構和功能，而不少學者對婦女研究的學術地位亦有明顯的歧視，認為這門「學科」滿是偏激之見，沒有科學化的研究體系，難登大雅之堂。這些質疑和偏見，是中國婦女研究必須面對和澄清的問題。

究竟中國婦女研究是否或應否追隨西方婦女研究的路線？西方婦女學的發展階段和條件與華人社會的婦女學發展有許多異同之處。雖然歐美國家的婦女學起步較早，但在早期的發展路向中，卻因犯了不少錯誤而遇到障礙，這可作為我們的借鏡。

西方婦女學的發展深受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第一期的婦運情況，可見於當年 Betty Friedan 的 *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一書，其內容主要是女性主義思想對傳統「女性化」觀念的攻擊。當時婦女運動的主流方向是革命，男女對壘的立場鮮明，表現方式激進，遂形成偏激的外觀。婦女研究因與婦女運動關係緊密而予人急進的印象。

自八十年代以來，美國婦運回顧了早期婦女運動的得失，Betty Friedan 的新書 *The Second Stage* (1986)檢討了第一期婦運的成敗，掀起婦運的第二期，重估家庭的地位，重申兩性角色的協調，不再堅持兩性等同，試圖改變女性主義者的形象。

相對而言，近代華人社會的婦女研究，並沒有西方社會的濃厚

婦運背景，主要的動力來自社會變遷過程中，學術界及婦女服務界對婦女本身及兩性角色轉變的回應。雖然部分婦女研究者本身亦積極參與婦女運動，但與早期西方婦運有明顯的分別，華人社會的婦女運動在強調婦女醒覺和自強之餘，並沒有將男女兩性對立，或將男性視為迫害者，而將女性視為受害者。中國文化着重和合性，重視家庭的整體，與 Friedan(1986)所述的第二期西方婦運的方向較為接近。

華人社會婦女研究的發展主要順應社會的變遷，以及兩性社會地位和角色的轉變，尚未擔當前衛領導的角色；但隨着現代社會中科技與訊息的進步，傳統農業社會的男女分工及家庭觀念已有轉變。據 Toffler (1980; 1984)的預測，工業社會後，人類轉入生產革命的「第三波」，工作的性質主要勞心多於勞力，而由於資訊技術發達，家庭可同時成為工作的地點，這些結構與功能上的改變，相應影響社會關係與家庭制度，並對男女的傳統工作和家庭中的分工，提出新的挑戰，作出新的評估。

這些社會演變，促使學者對現存的社會現象重新探討，開拓社會科學中被忽視的領域，同時，對各門學科過往以男性主體為中心所形成的偏差作出調整，修訂有關的理論。不論中外社會，婦女及性別研究在實質內容和治學方法兩方面，都有推展的必要。

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三地婦女研究的特色

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傳統在不同體制的華人社會中，成為維繫中國人的認同要素。這些文化傳統、社會觀念和習俗，比社會政策或教育制度更為持久，鞏固着男女傳統的角色和地位。

究竟甚麼社會因素對這些觀念發揮影響力？傳統中國文化的男

尊女卑價值取向是否與農業社會的經濟因素有關？或因父系社會傳宗接代的封建思想所致？傳統哲學和宗教思想怎樣界定兩性特徵及關係？以儒家為主導的傳統思想如何釐定社會制度及人際關係的理想標準？這些基本文化觀念的探討，是華人社會性別研究的重要課題，但過去的研究卻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正如郭佩蘭在〈性別研究與中國宗教傳統〉一文中所說，縱使儒家傳統對華人社會有深遠影響，但卻鮮見有從女性主義角度去全面分析儒家思想的研究。

至於中國婦女史方面，已有重要的研究基礎。本書中陸鴻基綜述一些近年研究中華婦女史的外文著述、葉漢明從女性主義史學和社會史角度探討中國婦女史的研究，以及杜芳琴從新的角度去討論古代宮廷婦女的政治角色等，都是在歷史研究基礎上的進一步闡論。相比之下，社會科學的研究，仍然只在萌芽階段。

假若兩性關係和地位是社會制度的產品，則大陸、臺、港三地的婦女發展便應隨着三地政治經濟體系的分歧而有不同的路線。過去四十年來，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鼓吹男女平等，女性積極參與社會勞動；憲法亦明確地肯定婦女的地位，全國婦女聯合會等官方組織，成為爭取婦女權益的渠道。儘管如此，中國大陸社會離男女平等的目標尚遠。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政治動盪和經濟變化，對婦女發展肯定有一定的影響。這都是急待開拓的研究領域。

臺灣社會除因國民黨政府遷到臺灣後進行種種建設而發生變化外，更受到臺灣本土及以往日本統治下的思想和教育影響。當地早期的婦女運動，因牽涉其他政治運動而受到挫折。隨着近十年的經濟蓬勃發展和政治開放，婦女接受教育的機會比以前多，同時在經濟和社會方面亦扮演較積極角色，婦女運動遂再勃興起來，這些社會變遷對婦女地位將繼續帶來衝擊，有關發展的方向實難預料。

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的社會，百多年來受到英國殖民地政府的

統治，一方面沿用了英國的法律體制，尊重人權和自由，保障婦女的條例，往往有英國法律的先例可援，但同時在殖民地的懷柔政策下，保留了一些清代遺留下來的社會律例和傳統風俗，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亦持續下去。在中西文化共存的社會中，婦女問題似乎充滿矛盾。在近二十年香港經濟的急劇發展及近十年的政治醒覺下，婦女地位有甚麼改善？面對九七年回歸中國的前景，婦女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存的體制下又將面對甚麼問題呢？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

上述的社會因素與婦女問題的關係，是大陸、臺、港三地婦女研究的重要課題，而將三地的研究比較，將有利於理論架構的建立，探討中國文化如何跨越時間和地域對兩性的角色和地位方面發揮影響力。我們也可用這套分析體系，進一步研究文化傳統與社會制度間的相互作用。

華人社會的婦女研究倘能植根於中國文化和吸取西方研究的養分，必對世界的婦女研究有重大的貢獻。要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婦女研究，必須考慮兩個重要課題：

- 一是反思中國傳統文化；
- 二是考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婦女生活的影響。

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思想，究竟怎樣塑造中國人對兩性關係的看法和如何具體地影響家庭及社會制度？過去的婦女研究學者在這方面的評論不足，這方面有待更全面深入的探究；至於西方婦女學界對兩性問題的多年討論，則比較能掌握西方文化根源性的弊病。她們指出西方文化的兩個主要源流，即希臘哲學及基督教思想，都有低貶女性的地方。柏拉圖等希臘哲人，將世界分為肉體與靈魂、現象世界與理念世界。他們認為女性與性和肉體有密切的關係，都屬於會朽壞的情慾世界，而男性則屬於憑理性掌握理念的永恆世界。基督教也受這種二元思想影響，將神與人、男人與女人、

理性與感情、天堂與地獄強烈分割開，並加上等級次序的界劃，因此，女性永遠從屬於男性，不能享有與男性同等的地位。

中國人男尊女卑的觀念是如何孕育及形成的呢？在儒家的人倫思想中，妻子明顯地附屬於丈夫，但在儒家的人性論中，卻強調每一個人均是善心仁性，可以透過修身反省，達到聖人的境界。這種對人的超越性的體認是否只適用於男性而與女性無關呢？此外，道家思想向來着重男女互補，陰陽調和，這是否較儒家尊重女性呢？以上種種問題，都值得繼續不斷探索。

華人女性生活在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制度中。香港和臺灣是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大陸則是社會主義社會。華人學者若能分析不同制度如何影響女性生活，將會在婦女研究上有較大的建樹。中國大陸的女性在社會主義的體制下生活了四十多年，她們的地位有何改變？這是一個具世界性意義的課題。部分的西方婦女研究學者強調資本主義與父系制度互相結合，形成所謂牢不可破的資本主義父權體系(*capitalist patriarchy*；參看 Eisenstein, 1979)，因此表現出對社會主義的嚮往。六十年代末期，不少婦女以新左翼(*New Left*)的立場投入婦女運動，對社會主義有美麗的憧憬。七十年代，西方對中國婦女的論述，很多都是充滿浪漫理想化的情調。八十年代，經過對文化大革命的檢討，學者比較能實是求是地分析中國社會狀況。關心中國婦女問題的學者如 Margery Wolf (1986)、Judith Stacey (1983)、K. Ann Johnson (1983)及 Phyllis Andors (1983)等，都指出中國婦運還要走相當漫長的路，中國婦女離真正解放的目標尚遠。

另一方面，亦有人批評社會主義女權分子沒有處理馬克思主義中性別分析的盲點。馬克思主義長於階級分析，卻忽視男女不同的問題，馬列思想對資本主義生產系統的剝削，分析透徹入微，卻沒有正視生育系統的性別歧視(Barrett, 1980; Jaggar, 1983)。這

方面的理論批判，在西方會引起激烈的論爭。在奉行社會主義四十多年的中國，其具體情況又如何呢？再者，近期中國湧現的婦女問題，究竟是社會主義無可避免的缺失，還是中國封建思想殘餘所致呢？

性別研究的抉擇

西方的婦女研究學發展較早，開墾了不少領域。華人社會可向西方吸取經驗，但在不同的發展條件下，不能原裝套用，而要面對一些基本問題和抉擇。

甲 性別學抑婦文學？

婦女研究是性別研究的主要內容。性別研究的發展源自婦女研究，兩者在名稱上也常常互通。在美國，婦女研究在近期逐漸發展為「性別研究」，因為婦女的問題也與男性問題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婦女研究與性別研究有重疊的地方，但也有各自不同的着重點。理論上，婦女研究以婦女為重心，嘗試從女性主體的角度考察社會中的性別建構；性別研究則着重兩性在私人及公共層面的關係及這些關係在社會變遷中如何調整。婦女研究一般與婦女運動密切有關，不少研究者也有女性主義取向。性別研究則採取較中性的立場，也給男性學者的參與留下更大的空間。

周顏玲在〈婦女學和性別學在中國社會的發展 ——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將性別學列為婦女學發展的第六期。顧名思義，性別研究涉及兩性間的關係，但到目前為止，課題大多仍以婦女為主，而現存的參考材料，亦較少從兩性角度探討男性課題。

過往的學術研究忽視婦女的角度，無論在選題和分析方面，均以男性的角度為主，更將從男性角度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推設為普遍現實。隨着婦女教育水平的上升和女性學者人數的日漸增加，這些「現實」遂不斷受到質疑。發展的趨勢是擴闊各學科的範圍，重新評估以往被視作「理所當然」的理論。由於婦女的社會角色經歷重要的轉變，她們所面對的獨特問題亦得到較大的關注，這些都是婦女研究的主要課題。

設立婦女研究的學科是否顯示女性學者須自立門戶，而男性學者則可維持傳統的主導思想，在學術架構上製造男女分割的界線？其實，隨着婦女地位的轉變，男性也受到某程度上的衝擊。若單談女性而忽略男女兩性同步的改變和配搭，研究便會流於片面。婦女單方面的改變，可能帶來矛盾和衝突。有些人將現代家庭分裂的趨勢歸咎於婦女的獨立，這固然反映了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觀點，但亦顯出從兩性相互關係的角度探索問題的重要性。

在轉型期的社會裏，婦女的發展須從女性為主體的角度加以重估。在社會改革、普及教育和專業服務等方面，都應突出婦女的獨特需要，但長遠來說，兩性的關係應有重新整合的發展。學術研究單位宜率先負起領導的責任，從性別的角度去探討男女兩性在現代社會面臨的改變、這些改變與歷史文化有何相合或分歧之處，以及對未來社會結構可能帶來的新挑戰。

西方社會由於婦女學發展較早，大部分學術單位都以婦女研究命名，至於華人社會方面，婦女研究起步較遲，分別在一九八五年成立的河南省未來研究會婦女學會和國立臺灣大學的婦女研究室都採用了婦女學的名稱，而香港中文大學的有關研究計劃則以性別研究為名，而成立於一九八九年的臺灣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亦以男女兩性為研究的主題。在目前階段，不論以婦女研究或性別學命名，有關的研究單位仍側重發展婦女研究的課題，而參與的學

者，大都以女性為主。收錄在本書的多篇文章，都就這問題提出討論。至於這些研究單位未來的發展方向，則有待日後的分析了。

乙 鮮明的女性主義立場？

婦女研究的興起，是要糾正傳統學科忽略女性角度的缺失，因此，有些婦女學的研究單位，強調以女性主義為依歸，並要求研究者認同這個立場。在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中，女性的發展受到多方面的壓抑，婦女的問題往往被認為源自婦女本身的弱點。女性主義直斥這些謬誤觀點，並從明確的女性角度分析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對一向自認為客觀和科學化的學術傳統提出質疑，擴闊了學術視野。

然而，女性主義是否婦女或性別研究應有或唯一的出路？在華人社會文化主流下是否適用？抑或是抗衡男性中心主義的策略？婦女或性別研究採取與男性中心主義對立的思想立場，會否成為另一套教條主義而局限了思想的發展？抑或可以作為一個導航指標，為開闢多元化的理論方向而作出貢獻？這些學術的價值取向，在乎學者本身的理念，婦女研究單位毋須採納單一的立場。目前，婦女研究在發展階段中，若能容納多方面的研究內容，將有利於這個跨國際學問的發展，並有助於長期的推動。

丙 婦女研究是否有推動婦女運動的責任？

西方婦女學的發展與婦女運動有緊密的關係，許多著名的婦女學者，都是婦運中堅分子。華人社會的情況又如何呢？在中國大陸，社會主義革命宣稱能同時解放婦女。恩格斯認為只要廢除私有財產制度及有效地使婦女參加生產勞動，婦女問題自能迎刃而解。